

“一带一路”与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价值链体系构建

◎ 蓝庆新 姜 峰

内容提要 在过去 30 多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有效地承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进入以转型升级带动经济持续发展的阶段,并正从全球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攀升,但总体仍处在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价值链环流的低端水平;而在中国不断扩大海外投资的背景下,中国产业的国际价值链布局正在深入进行,形成了以中国为枢纽的全球双环流价值链的初步格局。“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提出,将有利于推动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价值链的形成,把依靠发达国家的“外围”关系转变为以中国为“核心”的主导关系。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产业链合作,打造自身国际价值链,帮助发展中国家推动工业化,并提高中国产业国际位势,将形成共同发展的新地缘经济态势,促进全球经济治理格局的平衡。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国际价值链 双环流 产业链合作

(中图分类号)F75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5-0029-06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发展是迄今为止中国国际区域合作中最重要、也是中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内容,是中国未来开放发展的重要举措。其中,“一带一路”合作建设以国际产能合作、中国企业“走出去”为主。2015 年 5 月 16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提出装备制造和国际产能合作,将对“一带一路”的实施起到推动作用,促进从中国产品输出向产业输出转变,同时列举了电力、钢铁、有色、建材、轻纺、化工、航空航天、汽车、铁路、工程机械、通信、船舶和海洋工程等 12 个重点行业,以非洲国家和亚洲周边国家为主要方向进行产能国际合作。^① 2015 年 5 月 19 日,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制造 2025》文件也提出,落实“一带一路”战略部署,一方面可化解传统产业的优势富余

产能,促进其迈进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另一方面可推动重点产业国际化布局,推动功能升级和全球价值链转换,鼓励高端装备、先进技术向境外转移。^② “一带一路”建设担负着中国产业国际合作与转移的重要任务。以往的国际产业转移,往往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尤其是二战以来,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不断加速转移,形成了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如今,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也在推动中国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与产能合

^① 国务院《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5/16/c_1115304415.htm.

^② 《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制造 2025〉的通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inance/2015-05/15/c_127817932.htm.



作,成为中国布局国际价值链的平台。

一、“一带一路”有助于推动以中国为枢纽的双环流价值链体系形成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依托自身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等资源,主动承接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转移,从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做起,积极把握模块化生产带来的全球价值链、产业链重构的契机,^①实现了制造业的规模化生产能力和产业配套能力,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企业,促进了产业结构全面升级和转型。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作为世界增长级的作用大大减弱,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明显。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对外投资速度和规模的不断增加,中国也在不断通过产能国际合作打造自身的利益环流,从而初步形成以中国为枢纽的“双环流”价值链体系。一个环流是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以产业承接与分工、贸易、投资、资本间接流动为载体形成的价值循环体系,另一个环流是中国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以贸易、直接投资为载体形成的产能国际合作循环体系。在第一个环流中,发达国家是主导,中国仍处于较低的位势,处在产业链的低端,从事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活动,竞争优势容易流失,仍需不断努力向价值链上游攀升;在第二个环流中,中国凭借着庞大的制造能力和产业配套能力、适中的技术标准和技术水平、雄厚的外汇储备和资源调动能力,不断加大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合作,布局中国的产业全球价值体系,中国处于该价值环流的高端位势,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调整自身产业结构,实现与发展中经济体的互利共赢。在这两个环流体系中,中国越来越成为链接发达国家与亚非拉欠发达国家的中间节点和枢纽点。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上,亟需重构基于供给侧和需求侧需要的双环流价值链结构,也就是将依靠他国的“外围、受控”关系升级为中国主导的“核心、控制”关系,由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承包、接包”关系升格为“发包”

关系,由价值链的低端上升为高端,由“打工者”转变成“老板”。显然,这是一场关系到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革命性变革。如图1所示,“一带一路”既为实现以中国为枢纽点的双环流价值链体系,尤其是以中国为主导的第二个价值链环流提供了发展平台和空间,也为中国从区域大国向世界大国转型、构建适宜自身发展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提供了发展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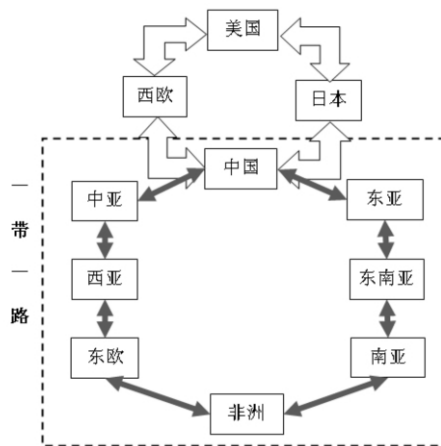


图1 双环流价值链体系

通过“一带一路”发展重构基于现代产业体系和沿线国家市场需求的双环流价值链,是要基于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和相关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工业化需要,重新调整与沿线相关国家之间的经贸产业关系,整合中国企业赖以生存的资源 and 快速发展的产业关联、循环体系,打造契合“一带一路”区域的价值链治理结构,奠定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基础。在全球价值链融合的平台搭建双环流价值体系,不是要放弃已有的全球需求和市场份额,而是从发达国家引领中国转化为中国引领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开拓市场范围和需求,提高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作出这一结论的主要依据是:

首先,“一带一路”涉及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市场需求巨大,发展潜力诱人。中国目前许多产业具有庞大的优势富余产能,尤其是在一些传统产业,在新常态下单靠中国的市场难以吸收化解,而这些产业对于“一带一路”沿线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

^① 张辉《全球价值链动力机制与产业发展策略》,《中国工业经济》2006年第1期。

展中国家而言,是其发展的必需。因此,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为重点构建新的价值链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一带一路”沿线的诸多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处在工业化初期或中期阶段,工业化发展水平均低于我国,产业发展的资本缺乏,吸引外资和争取外援需求强烈。而中国多年来形成的庞大制造业产能、优良的制造业配套能力、适中的产业技术标准和相对过剩的产业资本对于这些国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有利于我国在这些国家形成产业分工体系,规划产业链布局。

第三,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大多数发达国家仍处于弱复苏阶段,经济实力不足,且囿于本国的体制无力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和援助。同时发达国家在经贸和产业领域中的高标准,对于“一带一路”上的多数不发达国家而言也难以适应。而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有共同发展的愿望,具有大规模的投资和援助能力,以及处于中等水平的产业技术标准,恰恰能为“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重要的外部资源和动力。^①

第四,中国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已有30余年基础,企业也具有相对熟练的国际市场运营能力,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有着良好的经贸交流基础,积累了诸多开发经验。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的 价值链利益环流

遵循经济学中的“位势论”,世界各个国家都拥有独特的资源吸引力和比较优势,将在经济竞争、合作中居于某一位置。处于不同位势的两个同领域国家,具有不同的资源吸引力,高位势国家吸引力更强,经济资源由低位势国家流入高位势国家,通过资源的内化和重新整合,提升高位势国家综合竞争力,进而向更高位势迈进。低位势国家借助资源输出与国际合作,也不断增强本国竞争力,形成比较优势及后发优势,与高位势国家实现“双赢”。^②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中心由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经济体及新兴工业

化国家的代表,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突飞猛进,影响力不断提升,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具有较高的位势。而“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缓慢,经济发展滞后,位势相对较低。因此,以中国为核心的“一带一路”利益环流的形成能够充分发挥不同位势国家的比较优势,实现多层次、宽领域的区域经贸合作,促进多边利益的最大化。

在“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中,东盟-中国的经贸合作是亚洲地区最活跃的,东盟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也是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当今全球贸易疲软之际,东盟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却稳步增长,在加工制造、农产品、消费品、海洋资源等领域的合作促进两国贸易额迅速提高,2014年达到4721.62亿美元,同比减少1.71%,但仍是2001年的13倍多。^③ 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持续高速增长,2014年达到58.8亿美元,累计投资总额为352.1亿美元,^④ 2015年更是在2014年基础上增长了60.7%。^⑤ 作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第三大目的地,中国与东盟已经初步形成跨国生产网络,并逐步融入全球产业转型升级浪潮中。在东盟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服务业、加工制造业等领域,中国企业开发了许多投资合作项目,投资范围不断延伸。在贸易和投资不断增长的基础上,中国还与东盟各国加强了金融合作,设立投资合作基金,为东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和融资便利。南亚国家一方面是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重要聚集地;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优势富余产能的重要承接地,还是实现中国能源安全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基地。如当前中国为主导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开发巴基斯坦瓜达尔

① 钟飞腾《“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

② 张丽平、蓝庆新《以资本运作推动“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建设》,《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③ 数据来源: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

④ 数据来源《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⑤ 《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2016年1月20日)》,商务部网,http://www.mofcom.gov.cn/xwfbh/20160120.shtml,2016年1月20日。



港、兴建中巴铁路,使中国能够绕过马六甲海峡,开辟一条从印度洋到中国西部的国际物流通道,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相联通,可以促进中国富余产能(如钢铁水泥)等转移,也可以促进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铁)和新能源(如风电)等优势产能的扩张,推动相关区域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提升中国在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西亚、中亚国家是中国资源战略部署的关键区域,通过建设油气输送管道,深化双方油气资源合作,不仅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资源保障,更有利于该地区化石资源优势的开发,双边由此搭建起互利共赢的环流机制。

中国与非洲的利益环流主要表现在双边投资及贸易、对非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等领域。进入21世纪,中非贸易持续高速发展,2008年突破1000亿美元,2015年达到1790.3亿美元,比2008年的1068亿增长了67.63%,中国连续六年是非洲的最大贸易伙伴。中非贸易中,中国主要向非洲出口纺织服装鞋帽产品、轻工产品和机电产品,这些产品物美价廉,受到非洲消费者的欢迎,满足非洲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非洲则以其具有的原材料、矿产品、能源、初级产品等资源比较优势,向中国大量出口相关资源产品。原油是非洲出口中国的第一大商品,2012年非洲原油出口中国数量首次超越美国,中国成为世界上进口非洲原油的最大经济体。2015年,中国从非洲进口了1627.8亿元的原油、233.1亿元的铁矿砂和239.2亿元的钻石。^①在投资方面,中国不断增加对非洲的投资数额,兴修电网、水利、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扶助非洲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通过与非洲国家合作开发建设能源、矿产、铁路等项目,深化双边经贸合作。2004-2014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的年均增长速度超过50%,2014年累计投资存量为2460亿美元,^②对非投资排名前五的行业分别为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金融业、农业,投资主要集中在苏丹、阿尔及利亚、赞比亚、尼日利亚、南非等国,而2015年1-6月,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额为11.9亿美元。^③目前在非投资的中国企业已超过两千家,增加了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税收,带动了

就业,推动非洲经济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劳务合作与承包工程亦是中非经贸合作的一大亮点,2015年一季度,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工程承包新合同额为231.1亿美元,同比增长49.4%,截至2015年底,中国企业累计在非签订的工程承包总额超过4700亿美元,^④中国企业在尼日利亚、埃及、毛里求斯等投资开发的工业园区已成为非洲工业化的孵化器。作为非洲最有实力的承包商,中国企业带来了先进的设备、技术和充足的资金,对非洲员工进行了有效培训,直接降低了非洲基础设施建设成本,正在逐步改善非洲基础设施落后面貌。经过长期合作,中非价值链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中非经贸合作已进入多层次、多元化、全方位的发展新格局。

随着2003年中东欧进入经济增长新周期,中国与该地区的经济贸易往来日趋增多,双边利益环流也在合作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良性互动、互利双赢的新局面日渐呈现。中国与中东欧进出口贸易额由2003年的87亿美元增至2015年的1223.89亿美元。^⑤中国是中东欧地区重要的出口目的国,已在16个中东欧国家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贱金属及制品、机电产品、塑料橡胶、食品饮料是中东欧出口中国的重要产品;同时中国也是中东欧国家主要进口来源国,机电、化工、纺织服装是中东欧国家进口中国主要产品;中东欧国家工业经济基础较好,劳动力素质较高,政治社会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稳定,投资环境较好,成本较西欧发达国家低廉,且基本上加入了欧盟或与欧盟签订了自由贸易区协定,到中东欧投资可以打上“欧洲制造”标签,进入欧盟市场,因此吸引了大量中国投资。截止到2015年底,中国在中东欧国家投资已超过50亿美元,^⑥投资覆盖了中东欧所有国家,涉及家电、化工、机械、新能源、物

① 数据来源:海关信息网, <http://www.haiguan.info/>。

② 数据来源:《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③④ 《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网, <http://www.mofcom.gov.cn/xwfbh/20151117.shtml>, 2015年11月17日。

⑤ 数据来源:中经网海关月度库。

⑥ 《商务部召开〈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贸易博览会〉专题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网, <http://www.mofcom.gov.cn/xwfbh/20151117.shtml>, 2015年6月3日。



流、农业等,中国在所有国家的年投资额和承包工程额超过1亿美元。中国还建立了中国-中东欧“100亿美元专项贷款”和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用于中国企业投资项目和承包工程融资。中国-中东欧经贸合作方式不断创新、合作范围不断扩充,必将夯实和完善双边利益环流持续循环机制。

由于较高位势的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建立起双向循环利益环流,促使这部分区域与中国形成紧密的利益连接机制,初步建立起协调一致的利益网络,将促进以中国为核心的双环流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和开放型经济新局面的形成。

三、“一带一路”战略下以中国为主体的国际价值链体系的打造策略

推动中国为主体的国际价值链体系构建是当前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尽管中国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已经初步形成了利益环流,但是距离打造中国核心的国际价值链体系仍存在较大差距。因此需要大力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灵活处理各种关系,推动产业“走出去”、标准“走出去”。

首先,以模块化为基础推动制造业“走出去”。为了突出核心优势、降低成本,结合比较优势,可以将一些在国内相对附加值较低、非核心的制造业生产模块外包给“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沿线国家的劳动力优势和市场潜力,提高生产效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通过模块分解,中国制造业致力于开发核心技术模块,增加核心模块的附加值,不断强化和巩固核心模块的控制地位,占据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形成中国“智”造优势。同时,中国可以在充分了解沿线各国资源优势、生产制造能力的基础上,协调价值链成员国共同为客户提供更加丰富的产品服务组合,集合所有成员国的力量吸引更多的客户,增加每个经济体的业务量,促进其形成规模经济,推动工业化进程,实现互利共赢。最终通过价值链条的紧密分工合作,深化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经济关系,进而形成利益共

同体。

其次,促进对“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中的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全球化,可以发现,当前产业边界日趋模糊,服务业逐步渗透并融入制造业,融合服务业和制造业特征的产业新业态已经成为产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① 打造中国为核心的国际价值链,需要向“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进行制造业转移的同时,也应注重对能够为制造业提供支持的各类服务业的产业转移,根据价值链中职能等级的差异,从生产制造扩展到产品定位、设计开发、技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环节,持续进行跨国配置,形成遍布“一带一路”乃至全球的服务生产网络。当前应注重对有条件的“一带一路”国家(如金融体系相对稳定、中国基础设施投入较多、人员素质较好的国家地区)加大金融、物流、科技服务、商贸服务等行业的投资。

第三,促进中国标准“走出去”。尽管相较于发达国家,中国标准仍处在较低的水平。但对于工业化水平较低的“一带一路”沿线的许多不发达国家,中国标准仍然是较为适用的标准,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模式和经验也是这些国家学习的榜样。尤其是中国加大对这些国家的投资和援助力度,更是在推广中国标准方面具有一定的话语权。因此,要全面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标准化方面的合作和互联互通,积极推进标准互认,重点推广铁路、电力、钢铁、有色、建材、轻纺以及工程建设等领域的标准“走出去”,从而更好地支撑我国产业、产品、技术、工程等“走出去”,服务于以中国为核心的价值链打造。

第四,以“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促进国际产能合作。适应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强对“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参与的力度,尤其是采用PPP模式和BOT模式,颇受发展中国家欢迎,这对规避对外投资政治风险、带动中国出口贸易和产业升级,提升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和国际影响

^① 刘中伟《东亚服务生产网络的演进与变迁——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力十分有益。增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区域基础设施的投资和援助力度,促进中国装备制造业和钢铁、建材等相关产业产品的出口,消化过剩产能,进而扩大相关行业的海外投资布局,多方位打造境外经贸合作区、境外中国开发园区等,为产业链条的集群式转移和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价值链提供良好环境。

第五,突出企业合作,协调各方利益,有计划、有步骤地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市场。当前,“一带一路”区域许多发展中国家运用政策、法律等手段逐渐强化国内企业对资源的控制力,实行国内企业联手国外企业合作开发资源的模式。中国也应注意到这一点,突出中国企业与东道国企业的合作举措,坚持“资源增量共享”和“淡化政治”原则,尽可能地利用东道国本地公司的优势。由于“一带一路”上许多国家曾是发达国家的殖民地,尽管它们已经取得独立,但是发达国家仍对其具有影响力和较强的控制力,中国公司在进入这些国家市场的初始阶段不可避免会受到发达国家的阻碍,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仍未完全消除,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上扩展往往缺乏资金,处于有心无力的状态,但是又不甘心丧失自身的传统地位,面对中国资本的进入,如果不能参与,往往会发动自身控制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制造麻烦。因此,在开发“一带一路”相关发展中国家市场时,中国企业可以考虑与发展中国家当地企业和发达国家企业建立利益共同体,构建中国商品与资本、发展中国家资源与劳动力、发达国家技术与管理的协调发展机制,探索与发达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涉及的发达国家在

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合作模式,这样不仅能保护自身合法权益,降低投资风险,而且能有效回避发达国家在东道国设置的发展阻碍,及由于东道国政局动荡带来的消极影响,从而保障国际价值链的顺利打造。

四、结论

总之,“一带一路”是中国在全球价值双环流结构中,构建以中国为主导的国际价值链体系的重要平台。在此平台上,中国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产业链合作,打造中国为核心的价值链,这不是简单地转移过剩产能,而是基于当前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发展格局进行的和平崛起与全球和谐发展战略。一方面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自主发展能力,开展与中国的产能合作,促进其工业化发展;另一方面也推动中国的自主创新,通过价值链的打造,平衡全球经济治理与社会治理,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国际互利共赢。同时,围绕“一带一路”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绝不是一个短期行为,而是一项长期性、全局性的战略安排,中国将借此机会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跻身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也将向相关发展中国家转移部分产业,培植国际价值链和价值网络,拓展全球市场,形成与“一带一路”区域协同发展的新地缘经济态势,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
责任编辑:韩海燕

